

非洲华人社团的传承与演变(1950—2016)*

李安山

内容提要 华人在非洲的数量一直很少。随着中非关系的快速发展,华人移民非洲的人数日益增多。然而,对非洲华人社团组织的研究甚为薄弱。本文通过非洲的华人报刊和当地资料,力图阐述战后以来非洲华人社团的演变过程。本文阐述了两岸分治给非洲华人社团的政治生态带来的影响,作为华人统一组织的中华会馆的演变过程,分析了20世纪后期华人社团的发展及其特点,重点论及21世纪以来华人社团功能的延伸和拓展及新移民社团的崛起,并对华人社团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作者认为,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取决于三个条件,即社团领导人的国际视野、社团的性质以及社团所在国家的条件或社团自身条件。从宏观上看,国际化与地方化永远是移民社团的一种互动过程。

关键词 非洲华人 华人社团 新移民 国际移民 国际化 地方化

对非洲华人社团的研究十分薄弱,主要因为资料有限。国际学术界无专门研究,华人学者李卓凡、黄素珍等在著作中论及此问题。^①台湾学者在非洲国家华人概况中稍有涉猎。^②大陆学者对此问题少有研究,《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虽对非洲华人社团着墨不多,但对本研究有两点启发。一是作者对海外华人社团的定义,即“生活在中国本土之外的华侨、华人和华裔,为达到一定目标、按一定原则自行组织起来的、非以营利为主要目的的合法团体”;二是海外华人社团统计表中对1950—1991年非洲华人社团的统计数。^③梅显仁对非洲华人社团作了简短描述,认为非洲最初的华人社团是以庙宇形式出现的,此观点并不准确。^④有的文章在研究非洲华人时对社团有所涉及或是对某国华人社团作一简介。^⑤李安山虽对各个时期非洲华人社团有所论述,但对战后这一时期的研

* 本文为国家哲学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中非关系历史文献和口述史料整理与研究”阶段性成果,项目号为:16ZDA142。在写作过程中,沈晓雷、刘庆龙、董雪和李臻给予各种帮助,在此表示感谢。

① Huguette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Editions de l'Océan Indien-Chinese Catholic Mission, 1985, pp. 96-102, 294-296; 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our Mascarr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aris: L'Harmattan, 1996, pp. 211-240, 331-339。有关马达加斯加和南非华人社团的情况,散见于斯拉维斯基的著作以及叶慧芬和梁瑞来的著作。参见 Leon M. S. Slawews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Connecticut: The Shoe String Press, 1971;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Hong Kong University Press, 1996。

② 何静之:《留尼旺岛华侨志》,华侨志编纂委员会,1966年,第51—59页;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台北:正中书店,1989年,第33—40页;陈英东:《模里西斯华侨概况》,正中书店,1989年,第43—46页;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正中书店,1991年,第62—72页。萧次尹早年关于非洲经济的著作对毛里求斯的侨团有一定介绍。参见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海外出版社,1956年,第111—117页。

③ 李明欢:《当代海外华人社团研究》,厦门大学出版社,1995年,第4—5页。

④ 梅显仁:《非洲华人社团的变迁》,载《侨园》,1997年第8期,第42—43页。

⑤ 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新华出版社,1986年,第78—81页;石沧金:《衰微中的坚持与努力——毛里求斯华人社会发展动态考察与分析》,载《东南亚研究》,2014年第1期,第93—95页;为之:《留尼旺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1988年6月3日;缪化民:《马达加斯加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1991年9月10日;缪化民:《毛里求斯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1991年9月20日。

究过于薄弱。^①

21世纪以来,非洲华侨华人增长速度很快,中国移民非洲甚至成为西方研究话语中的重要内容。^②有鉴于此,考察非洲华人社团演变实有必要。本文通过非洲华人报刊和当地华人提供的资料,力图阐述二战以来非洲华人社团的演变过程。本文分为五个部分,分别阐述了两岸分治给非洲华人社团的政治生态带来的严重影响;作为华人组织核心的中华会馆的演变过程,20世纪后期华人社团的发展及特点,21世纪以来华人社团功能的延伸和拓展及新移民社团的崛起,最后就华人社团的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提出了自己的看法。

一、战后非洲华侨社团的政治生态

(一)毛里求斯华人中的爱国倾向

二战结束以后,非洲华人受中国大陆与台湾分治的影响较大。毛里求斯亲大陆的华人力量较强,一个重要原因是邓军凯先生等一批爱国人士。邓军凯在抗战期间为爱国捐输尽心尽力。后来,他出任新华中学校长,以仁和会馆、新华中学和《华侨商报》为核心,组建青年进修会、业余文化社等进步青年社团,并于1954年以非洲区华侨代表身份出席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大会。^③这既是对邓先生的褒奖,也是对当地华侨所作所为的肯定。多批华人青年回大陆访问求学,对新中国的成就有亲身感受。因此,毛里求斯华侨大多倾向于中国大陆。

这种政治倾向引起亲台湾华人的反击。实际上,毛里求斯以及非洲各国的华侨华人中一直存在着两派矛盾,华人报刊上的政治争论甚至骂战不时显现。^④1955年由个别华人起诉仁和会馆产业的案件是这种矛盾的激化。仁和会馆一直由亲大陆派掌握,亲台湾派力图“倾覆仁和产业”,向高等法院控告仁和旅馆已停止活动,请求高等法院判决该旅馆交由政府管理。1955年8月12日,毛里求斯高等法院判决否决了原告要求仁和产业应由政府管理的要求,认为仁和旅馆之职员能够负起保护仁和产业之责任。^⑤此诉讼表明:毛里求斯华侨中亲大陆派与亲台湾派中存在着严重分歧。一篇文章说明了这种局面:“就这个案件的整体说来,这并不是什么‘维护先贤产业’或是‘保护公产’(反动派向侨胞骗款的一种漂亮语)的案件,说穿了,这只是毛岛华侨的政治斗争,也就是本岛民主人士与被祖国人民赶在台湾一隅的蒋介石国民党死硬派企图倾覆本岛侨胞进步社团财产斗争表面化,……”^⑥这种政治歧见一度影响着华侨华人之间的团结。

(二)马达加斯加与留尼汪华人中的派别交锋

在马达加斯加,由于它的地理位置和“大岛”的作用及华侨数量较多,国民党在此地较活跃,虽然在1930年一些激进的国民党党员曾被法国殖民政府驱逐出境,但国民党支部一直活动频繁。侨领陈

① 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中国华侨出版社,2000年,第459—467页。

② 李安山:《国际政治话语中的中国移民:以非洲为例》,《西亚非洲》,2016年第1期,第76—97页。

③ 《邓军凯先生遗书二封》,转引自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6年,第257—258页;还可参见《纪念第一届全国人民代表非洲区华侨代表邓军凯先生逝世三周年特刊》,载《新商报》(毛里求斯),1957年11月15日。

④ 《李禹臣郑重声明》,载《华侨商报》(毛里求斯),1953年11月10日;《社论:那些回共产祖国的人》,转引自《中国时报》(毛里求斯),1954年3月18日。

⑤ “我们认为原告人提出维护仁和旅馆产业一案,鉴于上述特殊情况,及特别由原告人在1954年以前,对上述组织所采取的消极态度,如果被告人(古少彬及其他,他们于1955年6月10日同时为被告人)能提出适当保证的话,则我们认为此种保证即已足够,同时必须指出,被告人已表示,愿意提供适当保证,因此,我们批示:对于仁和旅馆产业的保管、维持,及正当管理的保证,应由被告人自判决日起十五天内签署十七万五千盾的证券,由二人至四人共同签署,签证人不动产,应值上述数额,未曾负任何债务,并且呈证明其为不动产所有人。如果被告未能依照上述各款提供食品店,则本院将判决司法委托。”参见《“仁和案”高院总结判词(判决)》,载《中国时报》(毛里求斯),1955年8月17日。

⑥ 小鱼:《仁和案的真相》,载《华侨时报》(毛里求斯),1956年3月12日。

铁魂在1948年被选为侨居海外国民第41区国民大会代表。1946年3月1日,国民政府在马岛设立领事馆,由谷兆芬出任领事,负责马达加斯加和留尼汪侨务。1949年,谷兆芬率驻马领事馆人员向中央人民政府投诚。^①此举对当地国民党势力造成一定打击。

据巴黎华侨时报讯:“旅居马达加斯加岛的华侨一致警告国民党反动分子,要赶快改过自新,投靠人民。该岛华侨二十余年来遭到国民党匪徒与法帝勾结的各种压迫与剥削。但在去年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后侨胞均感到他们的幸运到了。他们时刻没有忘掉祖国,而且需要富强的祖国来保护他们的正常权利。该岛华侨一致严正的警告国民党反动分子残余在海外的早日觉悟。如果反动到底,这是无疑问的等于自杀,如再梦想骑在侨胞头上压迫和剥削,那么侨胞一定联合起来以正义的力量将这反动党徒一脚踢进棺材里。”^②这种措辞现在看起来很情绪化,却真实反映了当时的政治分化。当然,马岛华人的两派仍不断交锋。“马达加斯加华侨支援反攻复国总会”成立于1962年11月12日,其意识形态色彩十分明显。1972年马达加斯加与台湾政府断交,华人两派一度形成对立。^③留尼汪当时受法国政府的控制,在发展与大陆的关系方面前期有起色,后受到掣肘,华人与中国的关系逐渐疏远。^④

(三) 南非华人中的亲国民党倾向

南非较为特殊,主要取决于以下因素。1904年,中国政府在此设领事馆。民国时期,国民政府又多次派人视察南非侨社,华人与中国政府的关系一直相对巩固。国民党当局退居台湾后仍与南非保持领事关系。领事馆的喉舌《侨声报》发挥着重要作用,不断加强华人与国民党政府的关系。新中国成立后,国民党政权仍然不断加强对非洲华侨的控制。1954年,台湾侨委会的代表萧次尹专访南非和葡属东非,以加强与侨社之联系。华侨的正统观念极强,始终认为国民党政权是正统,对其抱有希望。1967年,南非在台湾开设领事馆,1970年升级为总领事馆。1971年台湾被逐出联合国后在国际上更为孤立,与南非的联系加强,于1973年在开普敦设领事馆。这种政治上的互相依靠又因南非经济恶化而更为加强。1975年,双方签订有效期为三年的贸易协定,以促进贸易关系。1976年,双方关系由“领事关系”升为“大使关系”。^⑤这种局面对南非华人有直接影响,亲台湾势力一直处于优势。

1980年3月“中华民国总理”孙运璿访问南非,南非政府随之决定邀请华人代表参加总统咨询委员会,^⑥“总领事”罗明元极力推进。对台湾而言,华人有机会参与南非高层的决策咨询有益对南非施加影响力,但这一政策与南非华人致力于种族平等的一贯做法颇不相容。台湾避开侨社擅作主张引发华人极大反感,他们意识到其身份认同面临重要选择:做中国人还是南非人?^⑦总统委员会提名事件以及总领事违背大多数华人意愿卷入与南非政府的谈判等事件引起极大争议,在总领事与年轻华人之间本已不断升级的紧张关系中这些争议犹如最后一根稻草,最终引爆了华人社群内部关于效忠与认同的质疑,这些质疑已发酵了近四十年。在南非住了近一百年,一些人终于开始感觉更像南非人而不是中国人。教育和专业化水平增强了他们的自信心,他们认为自己至少能够在南非政府面前代表自身的利益。回应总统委员会提名的危机事件推动各地区协会重新交流,并

① Leon M. S. Slawewski, *French Policy Towards the Chinese in Madagascar*, pp. 167-168.

② 《马达加斯加华侨警告岛蒋匪徒赶快投靠人民》,载《侨讯》,第4期,1950年8月31日。

③ 陈铁魂:《马拉加西共和国华侨概况》,第38—40页。

④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58—59页。

⑤ 龙向阳:《中国台湾与非洲的关系》(未刊稿),第123—127页。

⑥ 关于总统咨询委员会,还有另外两种译法,“总统咨议院”(欧铁)与“总统委员会”(吕云芳)。参见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81—84页;朴尹正著,吕云芳译:《荣誉至上——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广东人民出版社,2014年,第58—59页。

⑦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410-414.

推动南非华商总会(CASA)在1981年成立。”^①国民党政府的威信受此次事件打击极大,南非华人不再将其视为自身代表。南非华商总会的成立对南非华人自身意识的觉悟起到重要的推动作用。^②

21世纪以来,新移民的各种社团不断涌现。非洲各国华人的政治倾向从多方面影响着华人团体及其与中国的关系。随着非洲国家的独立浪潮、中国与相关非洲国家建立外交关系以及中国在国际舞台上日益重要的作用,华人社团及社会交往的特点也随之变化。

二、非洲中华会馆的变迁

中华会馆(Chinese Chamber of Commerce)名称各异。除中华会馆外,还有中华总公会、中华公会、华商总会等。^③在相对陌生且恶劣的生存环境中,要经营好自己的事业,华人必须团结一致。中华会馆最初的任务是联合起来一致对外。华人社团的持续发展和趋向统一是战后以来的一个特点。中华会馆起着其他组织不可替代的作用,以各种方式提供服务和创造更多商业机会,为会员提供保护以减少因种族、文化、法律和其他因素造成的损失,对会员的生活困难给予实质性帮助。随着时间的推移,这一目的虽然仍然很重要,但其作用扩大到整个华人社区,如推动中文教育、联系情谊、帮助当地的华侨解决困难等。^④

(一)西印度洋地区诸岛的中华会馆

毛里求斯的华商总会成立于1908年,次年注册,是非洲成立最早的商会,也是被当地政府承认的华侨最高社会团体。华商总会组织健全,有自置的会所和固定经费,是侨胞的领导机构,设理事会,理事长每年改选,会址设在路易港。各地设有当地中华商会,具体情况见表1。二战后,毛里求斯的华商总会一度受到国共对立这一政治因素的影响而相对封闭,毛里求斯的著名华人朱梅麟一直担任华商总会会长。虽然华商总会在华侨与政府之间充当中介作用,但由于会员有一定的局限性,在华人中的影响力有限。^⑤

1916年成立的留尼汪中华总商会的功能齐全,有时甚至超出了组织的范围。^⑥然而,中华总商会在战后遇到政府方面的阻力,特别是留尼汪从1946年成为法国海外省之后。中华总商会于1953年被停办,这归于三个原因。其一,冷战时两个阵营对立的局面使法国敌视中国的政策传导到海外省。留尼汪当局对带有“中华”字样的“留尼汪中华总商会”这一名称提出质疑。其二,法国历来崇尚文化优越论,对殖民地采取同化政策。殖民政府曾强迫留尼汪和马达加斯加的中国移民改名。留尼汪成为海外省后,这一强制同化政策照旧,对华人采取多种规定,包括限制华文学校并迫使关门;要求本地学生上法文学校;华人组织也在限制措施之列。其三是竞争。华商的巨大竞争力使法

① CASA即后面论及的Chinese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朴尹正著,吕云芳译:《荣誉至上——南非华人身份认同研究》,第59页。

② 南非华人组织中具大陆特色的30个,台湾特色的44个,香港特色的1个,中性的10个,老侨特色的12个。参见《南非华人社团汇总》,http://www.nanfei8.com/bbs/forum.php?mod=viewthread&tid=4799

③ 文中除论及具体国家(地区)以当地名称为准外,统一叙述时将称为“中华会馆”。

④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321 - 326, 331 - 408, 412 - 414; 为之:《留尼汪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1988年6月3日;缪化民:《马达加斯加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1991年9月10日;缪化民:《毛里求斯的华裔族群社团》,载《华声报》,1991年9月20日。

⑤ Huguette Ly-Tio-Fane Pineo, *Chinese Diaspora in Western Indian Ocean*, p. 97. 有关毛里求斯早期华人社团,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150—155页,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第111—117页。

⑥ 二战期间,它鼓励华人生产必需品,发动华商为抗战捐输。留尼汪银行当时资金短缺,一度无法支付现金。商会便为顾客提供一种特殊货币,使高原区的种植者能凭借这些货币将劳动成果在华人小店换取生活必需品。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北京:飞和文化传播有限公司,2013年,第24页。

商感受到威胁,他们希望借助政府来打压华商。具有长期历史的中华总商会被迫停办。商会领导层经过多方协商并决定更改名称后,留尼汪当局才允许商会保留下来。1953年7月10日,留尼汪华商协会(ACCR, Association des Commerçants Chinois de la Réunion)成立,继续履行中华总商会的职责。^①

表1 毛里求斯华商总会及各地中华商会一览表(1954年)^②

地区	名称	负责人
路易港	华商总会	朱梅麟
东区	中华商会	李承柏
西区	中华商会	郑伯言
庞普勒穆斯区	中华商会	李仲民
罗斯希尔区	中华商会	陈达
博巴森区	中华商会	
百瓜区	中华商会	邹新华
居尔皮普区	中华商会	钟一肩
埋布区	中华商会	胡稍荣
咭磅区	中华商会	钟永璞

1960年期间,留尼汪华商协会共有成员400多人。因留尼汪华人一直将此组织称为中华总商会,以下文中仍以中华总商会相称。^③在维护华商经营生计的过程中,中华总商会与当地不断抗争。留尼汪酒类生意的利润比其他生意高。大部分华侨经营的商店都是杂货和酒类一起卖。1953年,政府下令禁止华侨经营酒吧生意,从而大大影响了华侨生计。法令公布后,中华总商会立即召集会员大会,一致推选首任会长刘文波(Akwon Lawson)之子、在法国获得博士学位的刘锡辉(Raymond Lawson)赴巴黎与法国最高行政当局交涉。经过交涉,法国政府承诺已领有酒吧业牌照者的权益得到保护,可继续经营,但不得将牌照转让他人。1956年,法国政府又颁发新例:凡持有酒吧牌照而兼营日用百货生意的商店须将酒吧与日用百货的营业场所分隔,不得混杂。条例的主要目的是不让到酒吧饮酒的顾客(绝大多数是男子)与购买日用百货的顾客(主要是女子)混杂。然而,华侨所经营的商店都是兼营酒吧和杂货。这些商店大都是家庭店铺,人手不足,实行分隔不仅会产生人手问题,而且有些商店因建筑关系无法使酒吧自成一家。中华总商会又一次请刘锡辉博士与当局交涉。结果当局同意改善,准许华侨在杂货店内间隔一屋,作为酒吧顾客饮酒场所,不必另开街门。此一修正使华侨商店免去了不少麻烦。^④

随着时局的变迁,加之华裔继承父业从事经商的逐渐减少,商会的影響力有所下降。商会进行了多项改革,包括70年代发行法中双语杂志以鼓励年轻人加入,80年代修改章程以对各种华人团体开放等。1992年,霍明祥(Francois FOCK-YEE)医生当选为会长。他与其他负责人商量后决定

① 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第74—75页。

② 萧次尹:《非洲华侨经济》,第111—113页。

③ 留尼汪中华总商会职员名单如下:会长张世模,副会长周焕多和曾昭敏,秘书霍训康,理财侯绍城,副理财李新奎,理事侯兴长、侯经始、刘锡江、刘智初、陈丽池、周孝尚、刘焕文、陈俊杰、张钊元,办公室秘书:夏明义。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53页。

④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67—68页。

将协会名称改为“留尼汪中国商人、企业家、管理者协会”(Association des Commerçants, Chefs de' entreprise et cadres Chinois de la Réunion)。^①这样,协会将所有华人团体联合起来,其代表性有所加强。从此,政府当局每当有涉及华人利益的公共事务或有关留尼汪经济、社会和文化的重大事宜或决策,一般都会邀请总商会的代表参与咨询。

在马达加斯加,华侨公社这一具有普遍代表性的组织仍在为各地华侨提供服务。1964年,马达加斯加有华人社团55个。当时,塔马塔夫的华人约3000人,有华侨公社,“此公社为一关帝庙,进门处为一红脸神像,忠义千秋,还供有香烛果盘,两扇大门贴有对联一副。令人如同置身中国大陆一般,可见华侨们对祖先们是如何地敬仰了。”^②到80年代初,马岛仍有24个华人社团,但未形成统一的组织,有的称为“华侨公社”或“华侨协会”,有的称为“中华会馆”,有的称为“华侨俱乐部”,有的称为“侨团”,还有的称为“青年会”或“同乐会”。在马达加斯加,较大的华侨团体为“塔马塔夫省华侨公社”和“京城华侨公社”。^③

(二) 南非及其他地区的华人统一组织

南非的约翰内斯堡为早期华人聚集区,华人组织成立较早,杜省(德兰士瓦)中华公会(Transvaal Chinese Association, TCA)成立于1903年。^④南非华人统一组织在1950年便开始酝酿,后来以南非洲中华总公会的名义活动,直到1954年4月才正式采用英文名称“Central Chinese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⑤该组织由15个单位组成,在20世纪50和60年代前期的反对种族歧视、争取华人权利的斗争中起到了关键作用。然而,诸如权力之争和个性不同等问题困扰着南非洲中华总公会。南非学者叶蕙芬认为在处理各种事务时,老一代华侨与青年华裔之间最关键的是“忠诚”问题——忠于南非还是忠于中国。由于各种矛盾和冲突,南非洲中华总公会于1967年停止活动。

从20世纪80年代以来,华人组织的聚合趋势有所加强。南非的18个华人组织于1980年开会,决定成立统一组织。这一决定源于前面提到的南非总统咨询委员会华人代表事宜。究竟谁能代表南非华人:台湾的“中华民国”政府还是南非华人自己?南非华人对这一问题反感有三个原因。一是该政策设计由白人政府提出,具有强烈的种族隔离涵义。二是华人一直致力于争取平等权利,此举却将华人与有色人和印度人作为另类对待。三是南非黑人社会对这一政策持反对态度,认为这种做法不可能解决种族问题。华人参与咨询委员会无异于将自己置于与黑人对立的地位。^⑥

台湾方面在未与华人商量的情况下越俎代庖,使华人认识到必须有代表自己民意的组织。1980年9月,南非华人组织召开大会,并任命了负责联合事务的委员会。1981年3月,18个华人组织参加了代表大会,决定成立南非中华总公会(Chinese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CASA)并通过组织章程,明确该组织代表南非华人的利益。该组织的宗旨是为南非华人争取所有权利;保持和维护

① 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r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p. 335-336.

② 郑向恒:《马拉加西侨情》,载《侨务月报》(台北),第166期,1967年6月16日,第25页。马拉加西即马达加斯加。

③ 方积根、李秀华:《马达加斯加华侨的历史与现状》,载方积根编:《非洲华侨史资料选辑》,第70—81页。

④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 99. 有关南非早期社团,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156—158页。

⑤ “Amendments to the constitutio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 of South Africa, adopted on 4 April 1954 at a General Representative Conference”, in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322-323. 欧铁认为该组织成立于1952年。参见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63页。

⑥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410-411; Linda Human, *The Chines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Freewheeling on the Frings*, Pretoria: University of South Africa, 1984, p. 63; 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82—83页。

华人的文化认同;保障和促进华人的利益;协助华人社区克服各种困难;培育华人间的和谐并促进华人社区与其他社区的友谊。南非中华总公会由6个地方华人团体组成,分别为德兰士瓦(6票)、东部省(3票)、比勒陀利亚(2票)、开普敦(1票)、东伦敦(1票)和金伯利(1票)。^①该组织的成立为团结南非华人作出了重要贡献。1996年,中国内地的新移民又成立了南非中华工商联合会,该组织的宗旨是认同一个中国,热爱中华民族;促进会员间事业发展;互助互爱;促进会员在中国与南非两国间积极开展经贸往来和文化交流,提高会员在南非的经济和社会地位。^②

位于莫桑比克贝拉的中华会馆是当地华人最大的团体,为华侨集资兴建,宏伟壮观,是马普托市大型建筑物之一,常有民众结群前往参观。早期的国民党支部租了一栋洋楼,内部设施按东方情调布置得富丽堂皇,后来衰落。致公堂会所是会员集资兴建的一座2层高的别墅楼,也很华丽,以前也曾辉煌过,后因资金短缺,会务活动日益减少,其总会设在南非的约翰内斯堡。贝拉港的中华会馆在60年代末未曾进行改革,颇有成效。这些改革包括与当地华侨妇女会联合举办活动,侨校建设,户籍调查,向中华会馆申请发给各种证件者,以及代填申请护照表格等,免收手续费。会馆的工作受到侨胞们的称赞。^③

中华商会在维护华人的利益方面起到了很大的作用。除了在华侨较多的毛里求斯、留尼汪、马达加斯加和南非等地外,津巴布韦华人在1962年成立了华人协会,科特迪瓦的华侨在1977年组成华侨联谊会,利比里亚(1989年)、多哥(1989年)等多个非洲国家也先后成立了中华商会或中华会馆。这些组织虽然由新移民创立,但仍在起着综合性的社会作用。

(三) 台湾华商的社会活动与台商协会

台湾从20世纪60年代起即不断有华商移民非洲。他们中有的是从农业援非的“先锋案”中留下来(或完成任务后返回非洲),有的是从国外学业完成后来非洲创业,还有的是直接从台湾、香港或东南亚来非洲经商的自由移民。台商的触角在20世纪60—70年代已经伸到非洲大陆的多个国家。^④当时,一位台湾人写到,在马达加斯加中国气息随处可见,丝毫没有身在非洲之感,因为“在商店林立的马拉加西街道上,到处可以看到中国招牌的商店,我们进去买东西时,特别有种亲切之感,此地的华侨大都是经商的,如经营进出口、日用品、照相馆等;也有的是开酒厂、烟厂的,可见华侨在此经济之雄厚,华侨们之所以在经济上占得重要地位,主要靠的是他们的刻苦俭朴,惨淡经营,这是非洲人士所赶不上的。”作者提到马达加斯加的华人组织与社团活动,例如“星马公社”、“华侨公会”等。有意思的是,这些社团既是他们聚会之所,也有他们的食堂和酒店,有的食堂装潢得古色古香,如宫灯红柱,充满着中国情调。^⑤可见,华人在马达加斯加的影响力不仅表现在经济上,还表现在文化上。

从20世纪60年代以来,非洲的香港和台湾商人日益增多,以前华人很少涉足的西非也出现了不少华商。20世纪60年代末,加纳华侨比起以往来增加了许多,连同眷属在内,人数共有250余人。^⑥随着台湾与非洲一些国家关系的推动,特别是农技援非“先锋案”的开展,使不少台湾人认识到非洲是一块宝地,可谓百废待兴,来经商的人日益增多,有的开始向非洲的轻纺工业领域投资,特

①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412-414.

② 温宪:《我们的心永向祖国——记南非中华工商联合会》,载《人民日报》,1996年10月3日。

③ 《卑拉中华会馆新行政新措施》,载《侨声报》(南非),1969年1月23日。

④ 徐知音:《中国人在利比亚》,载《侨务月报》(台北),第165期,1966年5月,第24页;徐炯:《侨居东非掇拾》,载《侨务月报》(台北),1969年4月16日,第18页;商岳衡:《在非洲的中国人》,载《侨务月报》(台北),第217期,1970年9月16日,第12页;雪峰:《侨生在象牙海岸》,载《四海之友》(台北),第13期,1975年9月15日,第14页。象牙海岸即今科特迪瓦。

⑤ 郑向恒:《马拉加西侨情》,载《侨务月报》(台北),第166期,1967年6月16日,第25页。

⑥ 王申望:《加纳华侨大聚会》,载《侨务月报》(台北),第199期,1969年3月16日,第30页。

别是纺织、搪瓷、塑胶等行业。台商的投资既是台湾经济发展和科技成果的外溢,也是非洲经济的需要。^①台商成立了自己的组织,主要是有助于他们经商的台商协会。

1994年,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African Taiwanese Chambers of Commerce, ATCC)成立,由非洲各地分会合组而成并隶属于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该组织宗旨如下:促进非洲各地区台商之联谊与互助合作,共谋发展工商业及开拓国际市场;加强非洲各地区台商间之联系与互助交换工商管理经验;提供非洲各地区台商各种工商及财经资讯,强化区域性经贸合作关系;提升台商之非洲社会及国际地位,促进各国对台商权益之保障;促进非洲各区域内社会文化交流,增进共同了解与经贸发展。^②基于这一原则,该组织每年举办年会,并有相应主题。例如,该会于2007年6月29—30日在南非约堡举办第13届年会,主题为“在地深耕·永续发展”,意在鼓励台商“将非洲真正作为他们的创业热土,在这片贫瘠又富饶的土地上耕耘;并发扬台湾人的精神,在这里生根发芽、成长,并取得永续发展”。^③2013年,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会长为黄柏锴。各国的台湾商会隶属于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基本分布情况见表2。

表2 非洲台湾商会基本分布(2002—2003年)^④

国家	名称	华人人数	台商人数
南非	非洲台商商会联合总会	45000	12000
斯威士兰	斯威士兰中华公会	1700	200
莱索托	莱索托台湾商会 ^⑤	6600	600
象牙海岸	象牙海岸台湾商会		35
加纳	加纳台湾商会		40
尼日利亚	尼日利亚台湾商会		24
马拉维	马拉维台商协会		60
毛里求斯	毛里求斯台湾商会	30000	100

中华会馆在当代仍然起着重要的作用。它们一方面成为中国政府的联络员,扮演着非官方领事馆的角色,负责接待来非洲参观访问的中国重要人士。另一方面,它们也成为当地华人利益的代表者,在沟通双方商界的关系到作用显著。此外,中华会馆参与各种文化交流。中国政府十分注意

①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416-423; T. T. Huynh, Yoon Jung Park & Anna Ying Chen, “Faces of China: New Chinese Migrants in South Africa, 1980s to Present”, *African and Asian Studies*, 9 (2010), p. 291; 陈怀东:《海外华人经济概论》,黎明文化事业公司(台北),1986年,第170—175页;陈怀东主编:《华侨经济年鉴1989年》,台湾侨委会,1989年,第714页;曾厚仁:《台商在斐投资回顾》,载《彩虹商旅》创刊(南非),1997年1月1日,第15—16页。

② 理事会为本会最高执行机构。由名誉总会长、总会长、副总会长为当然理事,及由各会员主体共推举五十人为理事而组成之理事会,理事任期一年,连选得连任。参见《非洲台湾商会联合总会简介》,http://baike.baidu.com/link?url=2fufcpHT2WCl0SpQ-bbwQOHRfZIV3hsZI57uVWvu59IuD_A_L37eCT8yQ_jII0yBhBMSwoma_yl60jBd5NeJj7vrkEuhOgWnoYlaqJN_ypMEansamQ58Icc6iW8bPacmQZ45aU74fEsiuobza8c724RtmiMZQ2mgYoro2EY276gWBtoVoK2kCITxCHmltuglthCMcwpIGKtg71QueIpF1_#reference-[1]-8689365-wrap

③ 会长黄咏翰主持了第14届总会长及理事会的选举,并选举德班的林资益为新一届总会长。参见《非洲台商会召开13届年会》,载《华侨新闻报》(南非),2007年7月2日。

④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 2002—2003年》,台北,2004年,第237—289页。

⑤ 莱索托台商于1976年成立中华商会,1995年为配合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更名为莱索托台湾商会。世界台湾商会联合总会之首任会长为莱索托台商、长青汽车董事长吴松柏。

培育对华友好力量,在重大庆典活动中,中华会馆总被列入邀请名单。

三、20 世纪下半叶华人社会团体的聚合与分离

(一) 华人社团的多样化

从西印度洋地区的几个岛国和南部非洲而言,早期华人以客属人和广府人组织为多,如南非伊丽莎白港的梅县侨商公会、毛里求斯客家人组织仁和会馆和广府人组织南顺会馆、留尼汪港口市梅县侨胞于 1959 年创办的华侨文化协会等。有的是宗亲性组织,以姓氏集团为主,如南非的霍氏旅馆、毛里求斯的林家馆、留尼汪的世昌堂(陈氏)等。莫桑比克的四邑会馆是广东四邑华侨组织,联安社是南顺华侨社团,其宗旨均为加深同乡联络,互相扶助,经费均靠月捐收入维持。有的社团以青年为主体,以联谊聚会为特征,大部分为文化娱乐组织,以音乐、舞蹈、摄影、文学为主要活动内容。还有华文学校的校友会,最著名的是毛里求斯的新华中学校友会、中华中学校友会和南非约翰内斯堡的国定中学校友会。

在留尼汪,华人社区的宗亲组织一直保持着旺盛的生命力。这主要归功于两个因素。一是虽然在殖民时期法国政府想尽办法推行同化政策,但华人以其特有的智慧用各种办法将其宗亲传统保存下来,因为这是他们唯一可以辨识和继承的家族因素。二是他们从早期就保存着宗亲会所的标识:聚会场所、祖宗牌位,亲人墓葬,这些活生生的物质存在成为他们宗亲组织延续的保障。留尼汪华人青年组织也比较活跃,特别是体育方面。从 1952 年以后,沿海各城市的华人青年先后组织篮球队,积极参与当地的锦标赛,历年奖牌多由华人球队获得。下表是各市的华人篮球队。港口市的梅县籍华侨在 1959 年创办华侨文化协会,原本计划办华侨小学,因立案及师资遇到困难,后改为俱乐部。1962 年,圣保罗市华侨陈育林、陈焕章等人及天主教华人神父蓝秉和等发起组织华侨青年体育会,内设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球队,另设国语会话讲习班和音乐班,有会员 58 人。同年,圣皮埃尔市华侨青年曾昭敏、陈造彝等人发动组织华侨体育文化联谊会,40 余名会员多为华侨知识青年。^①

毛里求斯的华人社团组织更是多元化,包括宗亲性团体,如新安堂(古)、吴氏清源联谊会、霍宅、何宅、刘氏商馆、西河堂(林氏集义会)、南阳堂(叶)、三槐堂(王)、安定堂(梁)、安定堂(胡)、沛国堂(朱)、河南堂(丘)、三省堂(曾)、陇西堂(李)、杨氏自治会、侯氏家族自治会、陈世昌堂、黎氏旅馆、刘关张赵古城会馆、陈氏爱敬社。^②地域性团体如仁和会馆、南顺会馆、丰顺同乡会、客属会馆。商业性社团如崇联馆、新生馆、集和馆、学陶旅舍、大联馆、联卫、嘉兴馆、岭南馆、岭东旅馆、嘉宁馆、竞业商驻、大同商馆、集宁馆、富国华侨、梅江馆、新隆永安、达卢革新馆安定商驻。校友会如新华中学校友会、新中红旗同学会、新中黎明同学会、中华中学校友会,群星同学会、培英中学校友会。全岛华侨组织如华商总会、关帝庙董事会、华人社团联合会、华人妇联会、毛中友协、(各地)妇联、华联会。华侨行业组织如各地中华商会、饼业、白酒行业协会、护商区分会,小商人协会、新华学校、中文教师联合会。^③

毛里求斯的社会团体具有以下特点:第一,得到政府承认并已在政府立案的并不多,47 个社团中,只有 13 个在政府立案,占总数的 27%。第二,姓氏或宗亲习称出现在组织名称的有 17 个,如吴氏延陵馆、刘氏商驻、王氏商驻、张氏旅馆、林家馆、侯氏安国旅社、陈氏爱敬社、李家馆、侯氏家族自

① 何静之:《留尼汪岛华侨志》,第 57—58 页。

② 宗亲组织每年开会选举理事会。参见《陈氏爱敬社通告》,《国民日报》(毛里求斯),1962 年 1 月 18 日。

③ 有关华人社团的情况,参见李安山:《非洲华侨华人史》,第 459—467 页。

治会、陈世昌堂、霍宅、黎宅、罗宅、何宅、钟氏敦睦堂,包括约定俗成的宗亲名称组织,如江夏堂(黄姓)、^①陇西堂(李姓)。^②第三,华侨多从事商业,极少从事医生、律师、教授、老师、工程师、记者等职业,个别已取得英国籍的成为政府公务员。有鉴于此,商馆、商社、商驻、旅社、旅馆、会馆以及以堂、馆、会、社等为名称的组织多以姓氏为集团,从事与商业有关的经济活动。这些组织既经营和协调商业活动,又进行各种与家族联谊有关的活动,类似俱乐部性质,既方便了各种姓氏的亲情联谊,又交换各种信息。当然,这种带有浓厚家族性质的社会组织的社会功能逐渐被新社会组织所取代,因为后者主要以职业、兴趣和娱乐方式为纽带。第四,还有的社会组织名称里直接带有联谊慈善的性质,如陈氏爱敬社、钟氏敦睦堂。

(二) 华人团体的政治化

在南非、毛里求斯、马达加斯加、留尼汪等地,华人因政治派别之争而屡屡诉诸报纸杂志,社团也成为政治歧见争斗的产物,如1968年在毛里求斯建立的中华文化中心即是一例。1974年,该中心曾邀请李登辉率领台湾裕隆篮球队访问毛里求斯,因球队获胜,被称为“一次极为成功的国民外交”。当然,中华文化中心在宣传中华文化,开设华文补习班等方面也做了不少工作。中华文化中心主席为朱梅麟。^③

毛里求斯华人以客家人居多,客属华人组织仁和会馆在当地政府与华人中享有较大声望。该组织一直热爱祖国,1949年10月1日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时,会所升起五星红旗。该组织曾组织不少华人青年参观访问中国大陆。1984年3月,仁和会馆的章程得以修订,在组织架构、产业管理和大众服务等方面得以完善。宗旨有五条:在本会会员或其眷属逝世时给予物质或财政协助;设立学校、图书馆等,给予大众的教育上的便利;促进大众的体育生活;协助本会贫苦会员或其眷属或其他大众;促进大众的文化、道德及宗教事业。^④在纪念该组织成立125周年时,毛里求斯总统和总理分别为会馆题词。总统卡萨姆·乌蒂姆写道:“仁和会馆在社会、文化与宗教领域里,长期为传统文化与宗教的存在而努力,是完全值得我们祝贺的。同时,我趁这个机会,对仁和会馆的创立者表示赞赏。他们的贡献,他们的激励,在为众多的毛里求斯人的家庭的生存起了作用。”^⑤

(三) 华人的青年文化团体

南非因盛行种族隔离制度,华人除了华商团体和宗教慈善组织外,其他社团几乎没有。金山大学中国学生会是一个特例。金山大学是南非率先接受华侨学生就读的大学。种族隔离期间,在金山大学就读的华裔学生占南非华裔大学生总数的70%以上。^⑥1949年,金山大学的华裔学生决定组织中国学生会,并选出该会主席黄岑华。金山大学中国学生会致力于改善华人医药待遇;解除金山大学对我华人学生的隔离;经常慰问住院病侨;与侨校各种活动取得联系;在可能范围内帮助各侨团;鼓励会员研究中文;成立中文图书室;举办文化座谈会;组织网球及各种不激烈之运动比比

① 江夏堂是世袭的郡望,源于江夏郡,是流传最广的一个黄姓堂号。江夏郡为秦南郡地,汉初置江夏郡,今德安、承天、汉阳、武昌、黄州境地。西汉以后,各朝曾设置江夏郡。

② 唐贞观十二年,唐太宗诏令天下,陇西为李姓的郡望。海内外李姓的郡望、堂号均以陇西命名。陇西堂位于甘肃省定西市陇西县城北关、渭河之滨的李家龙宫公园。

③ 副主席梁艳琴,第一副理事长罗新昌,第二副理事长侯忠芳,顾问李丽生,中文秘书严俊杰,西文秘书林国琪,财务黄吉祥、朱汉球,文康侯瑞玲、田挺芳,公共关系钟涛彬,理事钟旋楷、田禄芳,会计林连春,稽查田新芳。参见陈英东:《模里西斯华侨概况》,第40—42页。

④ 《毛里求斯仁和会馆章程(1984年3月修订)》,转引自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第323—327页。此章程为打字稿,系仁和会馆前会长刘攸宪先生在任期间所赠。

⑤ 摘自《毛里求斯仁和会馆建馆一百廿五周年——纪念特刊》,路易港,1996年11月10日。

⑥ 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68页。

赛;研究华侨一般社会经济问题;设法经常维持与各华侨社团联系等等。^①这一组织的成立为华裔学生的学业和生活带来了诸多便利。

非洲华裔团体中有很多是体育竞技和娱乐组织。毛里求斯华裔青年组成各种社会团体,包括文体体育方面或联谊友好及宗教慈善方面的组织。青年团体如新雄青年友谊促进会、青年进修会、新青年、中国青年友联会、西河青年会、野草青年会、中国自由青年会。文化体育团体如国乐研究社、蓝白健美会、长风体育会、海燕体育会、鹄江体育会、摄影联合会、培英武术中心(武协会)、飞龙体育会、波累太极会、荷精太极会、鸠必太极会、中华金狮队、中华武术醒狮会、阿洛拉舞狮队、中国音乐学校、中国文化中心、亚济拉艺术团、华龙会、齿轮会。球队(篮球)如长风、艺联、飞龙(甲)、飞龙(乙)、海燕、新雄、新友、野草、新风、华清、黑鹰、新中、星光、怒潮、朝阳。华侨宗教团体如华侨天主教会、华人基督徒聚会、关帝庙董事会。

在留尼汪,50年代成立了飞鹰队、东方队、疾风队、中华队、中正队、华侨队、光华队等华侨球队。1962年8月12日圣保罗市陈育林等人发起组织华侨青年体育会,分设篮球、排球、乒乓球等球队,还设有汉语讲习班、音乐研究班等。1962年12月圣皮埃尔市曾昭敏等人发起组织华侨体育联谊会。马达加斯加塔马塔夫华侨成立了华侨体育会(简称“华体”,这一组织有各种球队),当时葡属东非贝拉港的华侨成立了东华体育会。此外,一些宗教组织中华裔青年也相当活跃。

南非华人也组织起来自娱自乐。除了与经济活动相关的社团外,这些团体或是倾向文化娱乐,或是热衷体育竞技,或是涉及宗教慈善。在南非成立了不少弘扬中华文化,研习武术或强身健体的各种青年组织,如南非业余文艺社、中华文化中心太极拳社、中华文化中心国术促进会、约堡太极拳健卫会等。华裔青年还组织了南杜省体育会、北杜省体育会、中华体育会、金龙篮球队及各省的代表队。

南非业余文艺社成立于1950年,第一任主席为梁喜,霍汝芬也担任过主席。该社不仅为华侨带来了文学娱乐活动,也为侨社提供各种服务,贡献良多。当南非国会颁布种族分区法后,文艺社立即翻译成中文发给侨众。该会还努力推进华侨教育,一是帮国定中学演剧筹款,所得不菲;二是开办中华文化补习班,为那些失学者提供学习机会。该社举办华侨摄影展、创办《好望角》杂志、公演话剧,为提高南非华侨的文化水平,促进正常健康的文化生活、使中华文化发扬光大作出了不小的贡献。南非侨影社成立于1953年,社友都是南非摄影学会会员,常年参加各种影展。摄影成绩获社会好评。约堡开埠70周年纪念摄影展除展示自己会员的作品外,还从美洲、菲律宾和香港等地征集佳作,为南非举办华人摄影展的创举。1962年,约堡业余音乐社成立,会员80余人分为演奏组和演唱组。会员都是喜爱中国文学、音乐、戏剧的男女侨胞。演奏组经常演奏各种中西乐器,参加表演或伴奏,演唱则在各种场合参加公演,表演传统粤剧或时代歌曲。1982年8月15日,约堡中华文化中心成立,为华侨提供各种服务,进一步活跃了侨社文化活动。华人还有自己的慈善组织,如基督教华人敬老基金会、南非华人康宁安老院等。^②

四、21世纪非洲华人社团的新特点

21世纪以来,非洲各国华侨华人社团蓬勃发展,在南非尤其如此。西印度洋地区岛国的华裔社团多以专业、体育、娱乐、慈善为主,台湾侨胞虽以经商为主,也有从事文化和慈善活动。中国内

① 《金山大学组织中国学生会》,载《侨声报》(南非),1949年2月12日。

②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Colour, Confusion and Concessions: The History of the Chinese in South Africa*, pp. 391-401; Linda Human, *The Chinese People of South Africa*, pp. 63-65; 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51-54,65-69页。

地的主要以宗亲社团和经济团体为主。

(一) 华人社团及其功能的延伸

西印度洋地区诸岛的华人组织经历了各种变迁后,开始了新一轮整合和重组。除前面提到的中华会馆一类的组织外,留尼汪关帝中华文协董事会在1980年重组,因其会址设在圣皮埃尔关帝庙内而得名。其宗旨是联络感情,团结侨胞,介绍新中国,弘扬中华文化,为大众谋福利。该会拥有会员2000多人,现任董事会会长是钟松芳。^①留尼汪圣伯努瓦的中国文化协会(Chinese Cultural Association of Réunion)是由华裔发起的弘扬中华文化的组织。霍明祥组织了一个中国—留尼汪爱心慈善基金会(Association Solidarité Chine-Réunion)。^②

华裔周贤忠(Daniel Thiaw-Wing-Kai)的哥哥周国亮曾是中华总商会的会长,一直热心为留尼汪华人服务。周贤忠是华人社团联谊会(Federation des Associations Chinoise de la Réunion)的会长,前些年又和李顺成(Jean Cheung-Ah-Seung, 2013—2014年会长)等人负责留尼汪关帝联谊会,每年积极组织各种联谊活动。尽管他目前就任留尼汪中华总商会会长,但他似乎有用不完的劲。“与其他团体及个人合作帮我们更好地与本地融合。华人子女通过参加这样的活动,对中国文化的认识会更直观、深入,感情也更深厚。”他对自己的定位是“五个周贤忠”:信息工程专家、社会活动家、慈善家、多个商贸社团的参与者(如当地企业家协会会长)和一家之主。^③

华人学者廖裕常认为,中国近年来一系列通过社会、文化、语言和宗教实践推动“寻根”的行动极大地促进了留尼汪华人的文化回归。他提出了:“但是,这一积极推进中华文化因素重新回归的行动,对华人来说会否不是一种新的文化放逐而新的苦难来源?重新回归中华文化需要付出怎样的人文及心理代价?寻找‘中国根’是该种族一种新的社会幻觉,一种虚假的身份追寻吗?”他认为留尼汪华人与中华文化之间的关系已不存在,并认为在这个克里奥尔人占90%的社会里,中华文化几乎绝迹于日常生活。^④然而,从我们对留尼汪的研究和实地考察看,当地华人确实经历过法国殖民统治的强制同化政策,他们不能保留中文名字,不能开办中文学校或宣传中国文化传统。然而,经过这么长时间的禁锢与摧残,中国文化仍在当地随处可见,关帝庙存在于多处,华人正在圣皮埃尔重修一个更大的关帝庙。华人餐馆随处可见,留尼汪已将汉语纳入小学选修外语课程,这些都是中华文化的影响力。可以说,中国历史和文化传统开始重新受到重视,留尼汪华人与中国的关系在加强。

毛里求斯华人社团的最大特点是其多元化。在2016年最新社会组织名单上,除了与传统的经商相关的组织外,许多与文化教育有关,其中12个与中文教育、新华中学、校友等性质相关。另一类与中华传统文化有密切关系,与舞龙舞狮及武术或中国功夫有关的协会达10个之多,还有的与中国侨民文化遗产、中国历史、中国文化有关。第三类多与妇女、老年及健康有关。第四类是宗教组织。毛里求斯的南顺会馆于1998年与义兴公祠合并,在路易港的繁华地区盖了一幢新会址。在一些移民入籍政策较为宽松的居留国(地),华侨加入当地国籍的日益增多。一些传统意义上的地域性和宗亲华人社团组织由于其固有的封闭性和排他性,对于已经入籍的华人而言已无以前那种吸引力了,但这并非说传统华侨社团组织已无存在之必要。

① 笔者2016年11月访问留尼汪时,该会会长钟松芳及董事会负责侯沐凯、陈庆添等邀请我们中国代表访问圣皮埃尔,在关帝庙里进行交流并热情领我们参观新建的关帝庙和市景并赠送相关资料。笔者在此对钟松芳会长及留尼汪关帝中华文协董事会表示衷心的感谢。

② 有关留尼汪华裔青年的各种社团,参见Edith Wong-Hee-Kam, *La Diaspora Chinoise aux Mascareignes: Le Cas de la Reunion*, pp. 338-339.

③ 汤曼莉:《海上传奇:留尼汪华人华侨志》,第206-207页。2016年11月本人访问留尼汪时,周贤亮会长、侯沐凯会长和霍明祥前会长邀请我们访问霍会长住宅并共进晚餐,当地侨领侯慧慧女士、管美玲女士和陈庆添先生等均在场。霍宅是一座具有200多年历史的克里奥尔式建筑风格的文化遗迹,受到留尼汪政府的保护。本人在此对留尼汪诸位侨领的热情款待表示衷心感谢。

④ 廖裕常(Live Yusion)著,周舟译:《留尼汪岛华人后裔的文化回归:新的文化放逐?还是新的苦难?》,载吕伟雄主编:《世界海外华人研究学会地区性非洲国际会议论文摘译》,香港社会科学出版社有限公司,2008年,第229—236页。

传统宗亲组织的功能转向是华人社团的另一特点。以前,华人宗亲组织的排外性较强。时代变迁使这种功能弱化,为民众特别是特定群体服务的功能加强。毛里求斯的广府宗亲组织南顺会馆为适应老人需要,成立了南顺会馆老年人协会。有“唐人街百事通老人”之称的黎旺金(Mrs. Anne Marie Venpin)^①是南顺会馆的名誉主席,目前就在这一组织工作。她谈到以前的辛劳日子和现在的休闲时光:“那时候,为了能准时交付客人的订单,我时不时就得连夜赶工。如今,我已经老了,无法再从事那么高强度的工作了,我更乐意多花些时间做些力所能及帮助他人的事情。几年前,我被选为南顺会馆老年人协会主席,南顺会馆是由来自广东南海和顺德的移民组成的一个社团联盟组织。南顺会馆老年人协会对在毛里求斯的老年人来说是很重要的一个组织,它为老年华人们提供了一个交流的平台,大家一起交流防范老年人健康疾病问题,比如说阿兹海默症(老年痴呆症)。”^②一些非洲国家政府将扶贫慈善工作承担起来,从而使得华人宗亲组织的这一功能有所削弱。南顺会馆的这种转向既保持了宗亲社团的生命力,也能使社团成员老年时有所作为,老有所依。

《南非华人史》的作者叶慧芬和梁瑞莱在一篇论及新南非诞生后十年来南非华人社区发展的文章中认为,以前的南非华人内聚力相当强,因为他们要集中力量对付种族隔离制的各种困境。新南非诞生后,从台湾、香港和中国大陆涌进来的大批移民使华人社区人数大增,多元倾向增强,华人社团也丰富多彩,包括妇女组织、艺术文化组织、宗教组织、体育组织和贸易促进组织。^③

(二) 新移民团体的迅速崛起

华侨社团大量涌现是非洲华人新移民中的重要特征(详见表3)。这些社团基本上是循着华人移民国外的生存逻辑而逐渐建立。第一步为了生存,这是新移民抵达后的根本要求,他们在陌生的国土只有抱团取暖。袁南生认为,“非洲华人社团经历了一个从传统到现代、从靠忠义维系社团到靠会章组织社团、从组织单一到组织多样、从生存诉求到多种诉求的发展过程。”^④这一概括颇有道理。最初社团基本上是以朋友、宗亲或地域为基础,例如津巴布韦90年代末期成立的非正式组织“单身俱乐部”和“鞍山九人帮”,前者由一些未婚或已婚但配偶留在国内的青年组成,后者由9名籍贯为辽宁鞍山的老乡依年龄排序构成。^⑤这种为丰富个人生活而临时聚合且仅具联谊性质的社团难以满足新移民的需求。随着各种挑战及中国移民增多的新环境,一些致力于促进中国与所在国双边经贸合作和保障华侨利益的社团开始出现。

中国新移民的社团如雨后春笋般建立。以南非为例,在种族隔离制之下,华人社团少得可怜。然而,进入新世纪以后,南非社团猛增。有的社团具有性别意义,如2007年在约堡成立的全非洲女企业家工商联合会,前任和现任会长分别由陈丽辉和张晓梅担任,该会主要在南非开展活动。不少是地区性组织,如福建同乡会、闽南总商会、上海工商联谊会、黑龙江同乡会、南通商会等。在最近针对南非茨瓦尼市市长姆西曼加访问中国台湾省台北市的事件在《致南非民主联盟和茨瓦尼市市长的公开信》上签名的南非华人组织达106个。这一数字并未包括南非的台湾地区的华人组织。^⑥有的通过组织教会团体以促进华文教育。博茨瓦纳大陆新移民组织的光爱教育中心“以非营利和资源回馈的性质运作的。希望在最合理的教育收费与维持发展教育质量水平之间达到最好的平

① 参见 Pascale Siew:《唐人街毛岛往事》,Port Louis: Edition Vizavi, 2016 第 194 页。感谢李立大使和韩康敏参赞在本人访问毛里求斯时提供方便并赠送此书。有关活动详见 http://www.fmpc.gov.cn/web/wjdt_674879/zwbdt_674895/t1415960.shtml

② “The Living Repository of our Chinatown”, *ChinaTown Magazine*, July 2016, p. 27.

③ Melanie Yap and Dianne Leong Man, “The Chinese Community in South Africa after 1994”, in *Celebrating Ten Years of Freedom in South Africa and the South Africa-China Partnership*, People’s Daily, Special Issue, 2004, p. 97.

④ 袁南生:《走进非洲》,世界知识出版社,2011年,第240页。

⑤ 沈晓雷:《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载《国际政治研究》,2015年第5期,第134页。

⑥ 参见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会会长姒海致本人邮件,2017年02月24日06:35:00(星期五)。

衡”。中心使用大陆出版的华文教材,师资是爱神爱人、品学兼优、热爱教育、关爱儿童、大学毕业并经过专业培训的老师。^①

表3 非洲各国的中国新移民主要社团(2016年)^②

国家	名称	负责人	备注
埃及	埃及中国文化交流协会	马强常务副会长	会长为埃及人
埃及	华人联谊会	陈建南会长	
埃塞俄比亚	中华商会	周永生会长	
埃塞俄比亚	华人发展联合会	姜培军会长	
安哥拉	中国商会	许宁会长	
安哥拉	华商联合会	林峰平会长	
贝宁	华联会	陈宇会长	
博茨瓦纳	华人华侨总商会	胡中文会长	
赤道几内亚	华侨华人联合总会	金成立会长	
赤道几内亚	华侨建筑企业联合会	邓爱全会长	
多哥	华人华侨联谊会	谢燕申会长	
喀麦隆	华侨华人工商总会	陈伯松会长	下设分会
刚果民主共和国	中华联合总商会	林文钦会长	
几内亚	华人华侨商会	陈仁兵会长	
几内亚	中几文化交流协会	傅素华会长	
加纳	中华工商总会	苏跃华会长	
加蓬	华侨华人协会	张原惠会长	秘书长裴树成
津巴布韦	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丛玲玉会长	
津巴布韦	北方同乡会	罗跃胜会长	
津巴布韦	华商联合总会	李新峰会长	
科特迪瓦	华人华侨联合会	林新宽会长	
肯尼亚	华人华侨联合会	郭文昌会长	
肯尼亚	东部非洲中国总商会	韩军主席	
肯尼亚	东部非洲华文传媒联盟	韩军主席	
莱索托	福清同乡会	方则江会长	
卢旺达	华侨华人协会	尹晴日会长	
马达加斯加	华商总会	蔡国伟会长	
马拉维	利隆圭华人商会	周善建会长	
马里	华人华侨联合总会	陈学义主席	名誉主席欧阳日平

(见下页续表)

① 《光爱教育中心招生简章》,《博华日报》(博茨瓦纳),2008年11月20日,第6版。

② 非洲华人社团远多于此表。根据南非华人网统计,2009年已存在96个华人社团。此表仅列入主要社团。

(接上表)

毛里塔尼亚	华人商会	林文才会长	
莫桑比克	中华商会	蒋昭耀会长	创始会长(2007)
莫桑比克	福建总同乡会	王孝金会长	
莫桑比克	莫桑比克华人协会	黄类思主席	
纳米比亚	中华工商联合总会	林金淡会长	
南非	华商总会	郑星利会长	
南非	南非紫荆会	陈玉玲会长	
南非	南非华文教育基金会会长	韩芳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华侨华人联合工商总会	庄斌官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粤港澳总商会	陈玉玲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	姒海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乡会	李新铸会长	原南非福建同乡会
南非	南部非洲华人妇女联合总会	朱怡苑会长	
南非	南部非洲黑龙江同乡会	张延请会长	
南苏丹	中国商会	刘志勇会长	
尼日利亚	中国工商联合总会	董瑞萼会长	薛晓明常务副会长
坦桑尼亚	中华总商会	黄再胜会长	
坦桑尼亚	卡利亚库商会	涂强会长	
坦桑尼亚	福建同乡会	许火炮会长	
坦桑尼亚	中华矿业商会	冯瑛丹会长	
乌干达	河北商会	王文通会长	
赞比亚	华侨华人总会	张健会长	
留尼汪	浙江华商会	王险峰	

资料来源:报刊及网络资料;《非洲华人华侨社团一览》,发表时间为2008年8月21日,http://www.360doc.com/content/09/0129/17/19147_2414505.shtml;国务院侨务办公室相关文献(2013—2016年);《非洲25国华侨华人社团负责人聚厦研习》,海峡之声网,2015年7月12日,<http://www.vos.com.cn/news/2015-07/12/cms860646article.shtml>

香港华商从60年代开始投资非洲,特别是西非。目前他们在西非国家(如尼日利亚和加纳)的多个工业领域的地位仍然非常重要。^①最重要的是,一些著名的家族企业如查氏集团、董氏集团和李氏集团都在非洲发展得非常好,这种形势刺激了其他香港投资商。^②香港华商90年代开始投资南非。当时,相当多的大陆人移民香港,挤压了部分香港人的生存和发展空间。一些香港人担心1997年后香港回归后的经济发展受到影响。南非政府为吸引外资,于80年代后期颁布了多项鼓励外来投资移民

① 尼日利亚的香港人至今仍然怀念70年代的日子,当时经济发展相对繁荣,社会交往频繁,安全没有问题。Giles Mohan, Ben Lampert, May Tan-Mullins & Daphne Chang, *Chinese Migrants and Africa's Development: New imperialists or agents of change*, London: Zed Books, 2014, pp. 76—77, 86—87, 96—98, 147—148.

② 有关香港人在90年代投资南非的情况,可参见Xiao Xin, “Chinese Immigration to South Africa, from the early 20th century to the Apartheid years”, Paper Presented in *African Economic History International Conference*, Shanghai Normal University, June 12, 2016.

的政策。^①曼德拉出狱后,国际制裁放松或解除,南非经济前途看好。然而,尽管香港人的经济活动频繁,但在社团组织方面并不活跃。根据统计,21世纪初期,尽管南非华人组织已达100余个,但具有香港地区特色的只有1个。^②他们也有自己的社交活动或俱乐部,但带有区域性特点的社团较少,这可能有两个原因。他们投资非洲的多是家族企业,已经习惯于创业阶段的单打独斗,对那些在非洲投资初期的带有强烈地域性特点的社团不习惯。二是他们的国际化程度相对较高。

台湾在非洲特别是南部非洲也有各种团体,如南部非洲台湾同乡会、南部非洲台湾客属联谊会、绿社、南非华人妇女会、华心文教基金会、华夏体育总会、国际佛光会、慈济基金会等华侨华人组织、斯威士兰纺织成衣出口协会(台商与其他国家厂商一起成立)、台湾旅模(毛里求斯)同乡联谊会、台湾大专生在模(毛里求斯)协会。^③

与新移民相关的华侨团体涵盖面很大,有的是带有世界性组织的分会,例如世界华商在多个非洲国家设有分会,世界华商马达加斯加分会即是一例。第二类是全非洲的华人组织,比较突出的是2002年在约保成立的全非洲和平统一促进会,随后相当多的地区或国家都相继成立了和平统一促进会(简称和统会)。^④第三类是中资企业在相当多的非洲国家设有商会,如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会,这类商会往往设有会长单位和理事单位,会长单位由在该国影响力较大的中资企业担任会长单位,如津巴布韦中资企业商会的会长单位是天泽烟草公司,理事会单位15家,其中副常务副会长单位3家,副会长单位12家。需要指出的是,这种商会常驻人员很难算作移民,他们多是企业派往非洲的工作人员,有一定工作期限。

(三)新移民社团个案

津巴布韦新移民社团出现在90年代末。当时一些青年组成自娱自乐的非正式团体。沈晓雷认为,这种非正式组织不但丰富了当时人数很少的新移民群体的生活,更为此后建立的侨团培养了领导人。津巴布韦的两个最有代表性的团体为津巴布韦华商总会和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津巴布韦华商联合总会(简称“华商会”)是新移民在津巴布韦第一个正式的华侨社团,其成立源于2004年8月津巴布韦政府的一个通知。当时,津巴布韦政府突然宣布当月26日将大幅提高部分进口商品关税。绝大多数华商尤其是经营服装鞋帽及箱包的华商将因此遭受重大损失。为应对此突发事件,28位华商组织起来,在中国驻津大使馆的协调下争取了两个月的宽限期,从而避免了损失。以此为契机,华商会于当年10月3日在哈拉雷成立。2014年3月31日成立的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简称“华联会”)是另一重要社团。该会根据会员的籍贯或成员现在所居城市下设10个分会,包括北方同乡会、湖南分会、湖北分会、江浙分会、山西分会、布拉瓦约分会、奇诺伊分会、奎鲁分会、宾杜拉分会和穆塔雷分会等。

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 南部非洲的福建移民是最大的华人群体,这是学界公认的事实。^⑤正如早期中国移民一样,福建移民的社团组织是以宗亲地域为主,福建同乡会几乎在南部非洲每个国家都有,在莱索托甚至还有福清人同乡会。1997年6月29日,一批南非的福建新移民自发成立了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会长由全体理监事会成员以无记名投票的形式选举产生。2002年7月,他们

① 例如,1986年6月13日修改1937年的《外国人法案》第四段第三条款,实际表明来南非的外国人都有希望成为南非居民;前来南非投资的股东或主要投资人,均可申请长期居留权;金融上实行“外资优惠汇率”(Financial Rand);内政部大规模放宽投资签证。欧铁编著:《南非共和国华侨概况》,第85—91页。

② 袁南生:《走进非洲》,第243页。

③ 中华经济研究院编:《华侨经济年鉴 欧非篇 2002—2003年》,台北,2004年,第247、25—257、265、288页。

④ 非洲国家华侨华人希望和平统一反对分裂的活动的活动的相关资料,参见李安山编注:《非洲华侨华人社会史资料选辑,(1800—2005)》,第376—382,392—393,396—397,470—474页。

⑤ 参见万晓宏:《南非华人现状分析》,载《八桂侨刊》,2007年,第1期,第28页;Terence McNamee, with Greg Mills, et al., “Africa in Their Words: A study of Chinese traders in South Africa, Lesotho, Botswana, Zambia and Angola”, *The Brenthurst Foundation Paper*, 2012/2013, pp. 16—18.

又自愿出资 98 万兰特(当时 1 美元相当于 10 兰特)在约翰内斯堡西门町街 39 号购置地产作为福建会馆。开馆当天,正率领经贸代表团访问南非的福建省省长习近平亲临现场,为会馆揭牌。在致词中,他代表福建人民对远离祖国万里的福建同胞表示慰问,对福建会馆开馆表示祝贺,并希望南非的福建同胞生意兴隆,幸福平安,加强与家乡的联系,为福建的发展贡献力量。南非中华福建同乡会首届会长叶北洋指出,福建会馆是由福建同胞自愿赞助购置的,这充分体现了福建人的团结精神和中华民族的奉献精神,会馆为南非的福建同胞和中国同胞提供了一个必要的活动场所,会馆欢迎各界朋友光临。时任中国驻南非大使刘贵今和驻约翰内斯堡总领事叶明朗以及南非华人华侨数百人出席了开馆仪式。^①

自南非福建同乡会成立以来,福建人移民南非的人数迅速增长,南非福建同乡会 10 年来已拥有 1000 多名会员,成为南非当地社会具有相当影响力的社团组织。2007 年 9 月 13 日,南非福建同乡会理事会一致同意,鉴于南非福建同乡会在南部非洲发展迅速,决定更名为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乡会。2013 年,据南部非洲中华福建同乡会第九届会长杨天峙介绍,南部非洲福建同乡会是南非最大的华人同乡会,拥有 1.5 万名会员。该会不仅多次帮助福建老乡和其他华人渡过难关,而且在当地也积极捐款捐物投身公益性事业,为增进中南两国人民的友谊和发展两国的经贸往来做出了贡献。祖籍福建的华人在南非 30 万华人中超过三分之一。自第九次选举开始,会长和理监事会成员每届任期由两年变为三年。^②

(四) 新移民社团通讯工具的升级

随着网络媒介的快速发展,新移民团体将网页、电子刊物或网上论坛作为自身组织一种新的宣传工具,有的新移民组织的网上论坛成为非洲华人共享信息和交流信息的便捷平台。以下略举几例。

《非洲侨网》(www. qiaowang. org)是为了适应全媒体的发展需求,满足读者对非洲时事的关心,使读者更便捷地了解非洲《华侨周报》所报道的内容,面向全非的大型门户网站。主要报道非洲各国的新闻,中非关系也是其报道重点之一。

2014 年 3 月 30 日,由津巴布韦华商会主办的津巴布韦华人网(<http://www.zimbbs.com/>)正式上线。该网站以服务津巴布韦全体华人,提供新闻、信息、商业生活资讯和创建华人的精神家园为宗旨,下设津巴动态、商会资讯、政策法规、文学天地、国情介绍和商业信息等板块,目前已成为了了解津巴布韦和津巴布韦华人社区最重要的网络平台。《津巴布韦时报》(ZIMBABWE TIMES)是由津巴布韦华人华侨联合总会创办的微信公共信息平台(微信号为 zimbabwe-times),主要以报道津巴布韦当地新闻、非洲新闻、中非关系为主,同时记录华人在津巴布韦的生活、工作状况。它以民间人士的视角,透视津巴布韦社会百态,所设栏目主要包括新闻纵览、热点分析、投资资讯、华人社区和便民信息等。《津巴布韦时报》于 2014 年 12 月 1 日由华联会常务副会长赵科先生创办。该微信平台每周一、三、五推送,订阅客户近千人,受到包括中国驻津大使馆在内的广泛关注。华商会于同年 12 月 13 日推出的《津巴布韦华人网》微信平台正式上线(微信号为 Zimbabwe_ChineseWeb),每周一至周六推送,栏目设置主要包括华人社区、津巴布韦新闻、中非新闻和便民服务台,与津巴布韦华人网相互补充,成为继《津巴布韦时报》后的另一重要微信平台。^③

马里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网站办得有章有法,主要有四个栏目。在“关于我们”栏目有“关于我们”、“马里华人活动”、“关于疟疾、会员企业介绍”和“联系小编”等次栏目。“关于我们”主要介绍马

① 《南非福建会馆开馆 习近平为会馆揭牌》,2002 年 7 月 20 日,人民网/中国网,<http://www.china.com.cn/chinese/ChineseCommunity/176136.htm>;袁南生:《走进非洲》,第 243 页。

② 《南部非洲福建同乡会选出第九届会长》,2013 年 8 月 3 日,新华网,http://news.xinhuanet.com/world/2013-08/03/c_116795794.htm

③ 沈晓雷:《试析中国新移民融入津巴布韦的困境》,第 135—136 页。

里华侨华人联合总会的相关规章,“华人活动”里有关中国驻马里大使馆及中国驻马里大使的活动内容较多,关于华人的社会新闻较少,如果更接地气,效果更佳。“投资指南”是有关中国驻马里大使馆的通知、马里政府法规、财政预算方案、投资政策以及马里的劳工、税收和承包政策,还有对马里经商环境以及马里劳动法的介绍。“时政动态”有社会综合和关注非洲,分别介绍中国和非洲时事。

《尼日利亚华人网》是尼日利亚华人自己办的一个网站,集中报道尼日利亚及非洲时政,特别是及时转载尼日利亚当地报纸的报道,是一个及时了解非洲及尼日利亚的便利渠道,同时也提供签证、旅行、汇率等信息。用它自己的话来说:“我们不仅关注尼日利亚,关注非洲大陆,我们以全球视野,家国情怀,打造海外华人世界有见地、有深度、有观点、有内涵、有情怀、有乐趣的华文媒体平台。立足尼日利亚,辐射非洲大陆,走进尼日利亚的桥梁,了解尼日利亚的窗口。”

《安哥拉华人报》(Angolanews)是面向当地华人的周报,周六发行。现在开通的电子版定位为“安哥拉华人自己的报刊”(cnangola@163.com),及时报道当地经济社会消息,设有“安国华埠”、“本地新闻”和“勾搭小编”等栏目。“安国华埠”专门有“华埠早闻”、“头条推介”和“华企招聘”等内容。“本地新闻”则有“社会动态”、“经济发展”和“旅游资源”等标题。“勾搭小编”则有“优秀征文”、“黄页资讯”和“加入观察员”等内容。从新闻发布的角度看,颇有时效性。每期的“华埠早闻”有15条左右的新闻,内容涉及中国驻安使馆消息、较重要的中国企业活动(联欢会、慈善)、安防信息等。

五、国际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释疑

人类历史是一部移民史。从古代开始,人们从一地迁移到另一个条件更好的地方,或是为了生存,或是为了发展。到了近代,人类建立了一整套所谓国际体系,边界的设立成为民族国家的必备条件。无论是从国内或国际角度来看,海外移民成为了一个“问题”。然而,在古代,虽然交通条件并不优越,人们安土重迁,但如果从边界流动的角度看,人们的移民似乎更为随意。在印度洋地区,人们的迁移具有很长的历史。海上交通促使人们在亚洲和非洲之间移动和交流。^①这种人口迁移也留下了诸多值得探讨的问题。

刘宏通过对东南亚华人社团的研究,提出海外华人中存在着全球化与地方化的双重进程:“我们必须强调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是在日益地方化的背景下发生的,全球化与地方化在实际上是同一进程的两个方面。”他认为“海外华人社团国际化的主要动力是建立于地方性认同(文化、习俗、方言、社籍地)的基础上,而国际化的进程又反过来加强了地方性因素(如侨乡经济、海外华人对原籍的情感)的重要性,也成为海外华人社团在国界之内发展壮大的推动力。”^②虽然他似乎将“全球化”与“国际化”等同,但我想这一观点涉及的概念是指国际化。对于这一观点,具体情况要具体分析。

从非洲的情况看,由于存在着大量新移民这一特定因素,在移民初期社团的组建上,各种地方性因素仍然起着极其重要的作用,这实际上是世界移民过程中的一种惯例,也是人类在求生存谋发展的迁徙过程中的一种理性选择。然而,时代的变迁使中国向海外移民的条件有所改变。一是中国作为制造大国或“世界工厂”的定位,这为中国商品远销非洲提供了先决条件。二是科技的发展和互联网的普及使移民在与中国或非洲的营销环境以及一般意义上的经济和社会联系变得十分便捷。三是非洲大陆大部分国家处于工业化启动期这一因素为中国商品提供了广阔的市场,从而为

^① Li Anshan, “African Diaspora in China: Reality, Research and Reflection”, *The Journal of Pan African Studies*, 7:10 (May, 2016), pp. 10-43; Li Anshan, “Contact between China and Africa before Vasco da Gama: Archeology, Document and Historiography”, *World History Studies*, 2:1 (June, 2015), pp. 34-59.

^② 刘宏:《海外华人社团的国际化:动力·作用·前景》,载《华侨华人历史研究》,1998年第1期。

中国新移民准备了施展才能的空间,也对华人社团的功能转换提出了挑战。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会长姒海指出:“许多人相信海外侨团不过是少数‘自以为发达人士’借以炫耀成功和财富的台阶,抑或是‘一群乌合之众’的取暖烤炉,我们不否认这种现象和动机的存在,但我们从不如此定义自己。……在遥远的非洲,海外侨团不仅要成为同乡联谊的平台,也应该主动承担起坚持和发展族群利益的社会责任。我们提出把上海商会从一个‘同乡联谊性质的侨团向具有现代意义的商会转型’,这个‘现代意义’的内涵包括:在(居住国)政治上推出自己的代言人,在经济上融入主流渠道,在政策上有影响力、话语权和推动力。能不能做到,我们没有把握,但我们会坚持努力。”^①这种客观的定位应该是非洲或海外侨团努力的方向。

如何理解这些新移民社团的国际化呢?首先,他们从中国移民非洲并在当地成立社团,这种社团本身就是经济全球化过程的产物,是一种典型的国际化。然而,如果从“双重进程”的角度看,社团国际化取决于三个条件。一是社团领导人的国际视野。领导人或董事会是否有这种视野,他们是否看到了社团国际化的必要性。二是社团的性质。如果是从事大宗商品的社团,这种社团的国际性可能会显得十分必要;但如果是对社区进行某种特定活动的社团(娱乐、慈善、学习),成员可能觉得没有必要国际化。三是社团所在国的条件或社团自身条件是否具备。这一点应该是每个社团在所谓“国际化”之前应该考虑的因素。当然,从宏观上看,国际化与地方化永远是移民社团的一种互动过程。

Abstract With the rapid development of Sino-African relations, the number of Chinese immigrants to Africa is increasing. However, studies on overseas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Africa are rare. Through the Chinese newspapers and local materials in Africa, this article illustrates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Africa since the end of World War II. The article is divided into five parts and expounds the impact of the political ecology of Cross-Strait Separation on the Chinese community, the evolution of Chinese Society (Zhong Hua Hui Guan), and the development and characteristics of these Chinese associations in the late 20th Century. It also explains the extension of the functio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nd the rise of the new immigrant community, as well as the dual process of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at the beginning of the 21st century. The author argues that the internationalization of the Chinese associations depends on the following conditions, namely, the international vision of the leader of the association, the nature of the associations, the condition of the countries where the associations are located, and the conditions of the association itself. From a macro perspective, there is always interaction between internationalization and localization of an immigrant community.

(李安山,教授,北京大学国际关系学院,北京,100871)

[责任编辑:于红]

^① 姒海:《追逐梦想总是百转千回 让我们依然坚持追逐》,《追梦——上海人在非洲》,序,南部非洲上海工商联谊总会,2014年。